

# 浅析

## 日本的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 郭 梁 ·

日本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向来重视华侨华人经济问题，已有多册著作出版和数量可观的文章发表，其中有不少的观点和资料被国内外学者多次引用，具有广泛的影响。当我们讨论世界华侨华人经济问题时，系统了解一下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进行学术交流，以便更科学地认识和研究华侨华人经济问题，也许不无必要吧。

### 一

日本的华侨研究，大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后，为了适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和“南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日本对南洋华侨的研究、对南洋资源的调研曾经高潮迭起。也正是从战前开始，日本已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下过一番功夫。例如，台湾银行作为日本的特殊银行，早在1914年就出版了《南洋华侨与金融机关》等调研报告。以后的二十余年间，日本又出版了诸如《南洋华侨（支那移住民）与我国荷属东印度贸易》、《华侨（经济资料13卷12号）》、《华侨阻碍我南洋贸易的真相》等调查报告。随着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关于南洋华侨经济的调查报告也骤然增多，如《南洋华侨经济力的检讨》、《关于华侨捐款的报告》、《南洋华侨及其对本国的投资、捐款问题》、《华侨的蓄财形态》、《华侨仲介商业和价格的形成》、《从投资和捐款看华侨经济状况》、《南洋华侨将来的产业领域及其发展的可能性》等等。与此同时，也有为数不多的华侨经济研究著作出版，如福田省三《华侨经济

论》、井村薰雄《外国对华投资和华侨捐款》、根岸佶《华侨杂记》、大形太郎《南洋华侨和经济》等。但作为战前有代表性的华侨经济著作，则是出版于1939年的《华侨经济论》。

福田省三认为，华侨经济论是国际经济论研究的一个部份。他利用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研究国际经济论的机会，完成了《华侨经济论》一书。作为日本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华侨经济专著，书中先用一定篇幅论述了华侨的定义和移居历史，然后用大量资料和统计数字，系统地论述了华侨经济的基础、华侨经济与南洋各国经济的关系、华侨经济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第一，在估计各产业部门中华侨投资额的基础上，估算南洋各国华侨资本投资总额为40亿日元（约合10亿美元），对全世界的华侨投资提出了50亿日元的估计数额，<sup>①</sup>这是日本学者首次系统研究华侨投资额问题。游仲勋教授认为，这种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的、按照产业部门投资额进行估算的研究方法可谓当时最高水准的研究<sup>②</sup>，比之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卡里斯(H. G. Callis)那种仅仅构筑在国别估算基础上的投资额研究，更略胜一筹。第二，肯定了华侨经济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时指出了华侨经济面临的困难和自身存在的致命弱点，即华侨经济中商业、金融业所占比重过大，缺乏强有力的工业生产部门作为后盾，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第三，指出了当时南洋各国华侨经济受到的中国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当然，应该指出，这本

著作的基本政治立场，仍然是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为进行辩护的。例如其结论主张，华侨经济只有与“东亚经济”合作才有前途，要求华侨经济与日本经济“互助连环”行动；又例如书中批判中国政府号召华侨捐款的政策、诋毁华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抵制日货的行动等等。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由于系统整理了南洋华侨经济的有关资料，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南洋华侨经济资料，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仍可以说是日本较早出版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华侨经济专著，非此前日本出版的那些情报式研究成果所能比拟，本书中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和观点，至今仍被研究华侨问题的学者所征引。除了《华侨经济论》以外，根岸侷著的《华侨杂记》是研究华侨经济组织的重要著述，根岸侷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华侨基尔特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华侨社会经济组织的本质是基尔特（guild），华侨基尔特是中国基尔特在海外的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对战后日本的华侨社会经济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井村薰雄著的《外国对华投资和侨汇》一书，是有关华侨经济专题研究的另一著作。该书较早注意到列国对中国的投资与南洋华侨向祖国的民汇投资问题，颇值得一提。

战前的华侨经济研究，也散见于日本出版的一般性、综合性的华侨论著中。这些著作尽管不是华侨经济专著，但是一般都设有华侨经济的专节、专章，而且份量较重，论述详尽，资料相对丰富。这也反映出战前历史背景下，日本对南洋地区华侨经济力量的重视与畏惧。

## 二

60年代初，著名华侨研究家美国学者威廉·斯金纳曾经指出：“西方的华侨研究有忽视经济研究的倾向。”<sup>③</sup>而战后以来，日本的华侨研究却正是重视了社会经济领域，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明显，其学术水平

处于领先地位。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学者对华侨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华侨经济类型的研究；②对华侨社会阶级构成的研究；③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变化的研究；④对华侨资本形成发展以及资本额的研究；⑤对华人企业集团、社会经济组织的研究；⑥对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华侨华人经济地位、作用的研究；⑦华人经济的区域性合作和“华人经济圈”的研究；⑧对东南亚国家有关华侨经济政策、中国的华侨政策的研究；⑨对日本华侨社会经济的研究等等。以上问题的研究，几乎囊括了华侨华人经济研究中所有的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因此，甚至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社会经济课题展开的。

### 1. 关于华侨华人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华侨华人社会经济的学者中，可以举出像内田直作、须山卓、游仲勋、河部利夫、冈田芳政、李国卿、冈本隆三、市川信爱、江头数马、松本国义、岩崎育夫等名字，他们都发表或出版过有份量的著述。但最有见地、最有贡献的华侨经济研究家当首推游仲勋教授，他的研究代表了战后日本学术界研究华侨华人经济的最高水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的成就是通过多年来在科学道路上努力攀登取得的，在长期研究华侨华人经济和中国、东南亚经济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华侨经济的研究》（1969年）、《东南亚的华侨》（1970年）、《华侨政治经济论》（1976年）、《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1990年）、《世界的华侨——华侨、华人经济势力的扩展》（1991年）、《华侨能改变中国吗》（1993年）以及《现代计划经济论》（1971年）、《南北问题剖析》（1980年）、《中国经济剖析》（1983年）等多部著作，另有

多篇论文发表。《华侨政治经济论》、《东南亚的华侨》已由海峡两岸的学者分别译成中文出版。

《华侨经济的研究》是游仲勋教授的成名之作。的确，这部著作第一次全面地归纳和论述了华侨经济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和论证了华侨经济的性质和特征，当时就被评价为“战后华侨研究中真正唯一的好书”。<sup>④</sup>具体来说，游仲勋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详细整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料广征博引，对华侨经济研究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第一，对“华侨支配着东南亚经济”等传统、流行的观点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所谓“支配着东南亚经济”的华侨其大多数是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华侨经济既要受到帝国主义和土著民族统治阶层这两种外部的支配，又要受到华侨社会中支配阶层的内部支配，而华侨社会的支配阶层是从属于帝国主义和土著民族支配层的。第二，与“华侨支配东南亚经济”这一错误观点相连的是“华侨多是富人”等陈腐观点，游仲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华侨经济，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过去虽有极少数的国外学者例如日本的米泽秀夫等也涉及过华侨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但更多的学者则受到英国学者富尼华“多元社会论”的影响，多从不同种族的经济职能、地位去分析和论述东南亚社会经济问题，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没有接触到各种族内部的社会阶级构成。游仲勋在本书中用相当篇幅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华侨社会在战前战后的阶级结构，然后得出结论：从全世界华侨的总体来看，占绝大多数的是自身从事劳动的劳动人民，是被支配阶级，所谓俗称华侨为“财主”或“富人”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提出了“华侨经济的商品经济特征”这一重要观点。游仲勋认为，华侨经济集中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

非农业方面，在华侨就业人口中华侨农业人口所占比重极低，华侨经济事业大部集中在城市地区；另外，即使是华侨农业也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瞄准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因此，华侨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商品经济发达。第四，对“华侨资本额”的研究独具特色。在游仲勋之前，日本学者中仅有福田省三对30年代的华侨资本额，松尾弘对50年代的马来亚华侨资本额提出过估算。游仲勋在本书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资本”、“投资”的概念，认为华侨资本不是一般的华侨资金，而是指能用来生产剩余价值以及可期待增殖的那部份资金额。根据这一概念，游仲勋估算东南亚的华侨资本为：1929—1933年世界恐慌前约为7.44亿美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约为5.94亿美元，战后1968年的华侨资本额为35.3亿美元。<sup>⑤</sup>第五，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就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与其说是‘华侨经济的研究’，倒不如说是华侨资产阶级或者华侨资本的研究更为恰当。”实际上，本书提出了围绕华侨经济研究的所有重要问题，而从理论上探讨华侨资本的形成、发展、特点、性质尤为突出，且结构严密，资料翔实，堪称研究华侨经济的奠基著作。紧接着在1970年出版的《东南亚华侨》一书，浓缩和概括了《华侨经济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可称之为华侨经济问题的入门书。

70年代中期，游仲勋的另一重要著作——《华侨政治经济论》出版了，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本书也是对《华侨经济的研究》一书的补充和发展。作者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华侨经济的理论和方法，阐明了从国际劳动力移动和民族问题的角度去研究华侨问题的必要性。本书继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研究华侨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对华侨农业经济的研究颇具匠心；在资料运用方面，也尽量使用各国华侨的材

料、文献等，避免过去偏重于泰国华侨资料的缺陷。本书还及时地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对华侨经济的影响，认为60年代中期以来华侨经济的变化固然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但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居住国的政治因素，提出“东南亚的华侨经济将随着世界经济潮流及居住国经济的局势而发展，它将树立起由上述因素决定的发展理论和规律，今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无论有什么变化，也决不会使其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华侨社会在当地的定着程度愈深，与中国的关系势必愈趋淡薄，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sup>⑥</sup>应该说，这种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见解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

## 2. 关于80年代以来华人经济变化的研究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利用、吸引外资政策，到了80年代中期已见明显成效；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80年代也已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经济实力有了迅速发展，华人经济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化和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于是，海内外中国人或华人的经济联系或合作便成为热门问题。游仲勋教授在1985年提出了“新的中国人经济圈”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经济的发展而加入到国际经济行列中来，又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中国人经济圈正在出现。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亚太世纪的重要角色是中国人和华人。近三年来，游仲勋教授又发表了许多新作，特别是他于1990年前后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他提出的“中国人、中国系人是亚洲太平洋时代潜在的主角”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各国华侨华人经济在内的新的中国人、中国系人经济圈正在形成”的观点。他提出

了如下五点根据：（1）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四小龙”中，台湾、香港、新加坡居民的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华人，所以也可以称为中国系NIES；（2）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华人起了重大作用；（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92年后经济出现高速增长；（4）东南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引进了日、美等国外资，可是，近几年中，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等“中国系外资”（华人资本）直追日、美投资，甚至超过了日、美在东南亚的投资；（5）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不仅在东南亚、亚太地区发展，而且向全世界扩展。<sup>⑦</sup>因此，游仲勋认为，正由于中国人、华人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的巨大经济力量而崛起，说“中国人、华人的时代已经开始也并非言过其实。”<sup>⑧</sup>当然，关于“华人经济圈”的研究，游仲勋的观点也是有发展的，他的最新提法是“新的中国人、华人经济网络”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的中国人、华人经济结合体”，或者“新的中国人、华人市场圈”。游仲勋教授认为，尽管某些华侨华人居留国对“中国经济圈”的提法存有疑虑，中国为避免误解起见对此类说法也十分慎重，可是事实上却存在着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是由于政府或有关当局之间缔结协议产生的经济合作体，而是由于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由于市场的力量而形成的“经济圈”或经济联系体，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游仲勋的新作之一《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则较为全面和详细地论述了战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巨大变化，在观点上除坚持批判“华侨支配东南亚经济”、“华侨多富人”等错误说法以外，还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提出新的估计。他认为80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华侨华人所得按现行价格计算已超过

500亿美元,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以资本额来看,已超过500亿美元。<sup>⑨</sup>而游仲勋教授对70年代中期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估计数要小得多:华侨华人所得60亿美元,人均所得445美元左右,华侨投资额(华侨资本额)仅为40亿美元左右。<sup>⑩</sup>游仲勋教授在该书中还充分肯定了华人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提出,华人全球化的趋势,使华人的经济网络也在扩大和重新编组之中,华人将成为亚太时代的主角,至少是主角之一。至于儒家文化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经济发展发生的重要作用,游仲勋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与其说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倒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具备了经济发展的自然(或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此外,该书还围绕华人经济的变化等等,论及了华侨华人社会、文化的变化,当前华人移民四大源流的现状以及海外唐人街的变化。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把握了东南亚华人乃至世界华人的最新动向。

### 3. 关于华侨经济史的研究

战后日本的华侨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华侨经济史的研究,内田直作、须山卓等数位学者发表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

已故的内田直作教授,是著名的华侨研究家,也是战后日本较早从事华侨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名著《日本华侨社会之研究》于1949年出版,<sup>⑪</sup>紧接着出版了与盐胁幸四郎合编的《留日华侨经济分析》,1953年又发表《本邦华侨经济》,使他达到了日本国内学术界研究本国华侨的最高峰。五六十年代,他发表了研究华侨经济发展史的许多重要论著,例如《华侨资本的前期性质——以马来亚陆佑财阀为中心的研究》(1951年)、《华侨资本的发展形态》(1955年)、《东南亚华侨和印(度)侨的

经济活动》(1964年)等等,1970年出版了他的研究论文集《东洋经济史研究(之一)》,其中关于华侨的研究占有一半篇幅。1982年出版了《东南亚华侨社会和经济》一书。内田教授的研究偏重于华侨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华侨资本的积累以及华侨经济组织等,论述严谨,资料丰富,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独有见解。例如《东南亚华侨社会和经济》一书<sup>⑫</sup>,在理论上沿袭了日本根岸侑博士关于“华侨基尔特”的观点,在资料上运用了大量华侨会馆和社团组织出版刊物的材料,对曼谷、仰光、新加坡的华侨社会结构作了细致分析,着重讨论了华侨社团组织与华侨经济的关系。内田认为,正是由于海外华侨社会的经济结构上有商业基尔特、商人基尔特在顽强地发挥作用,使得血缘的、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关系支配着华侨社会,建立了自主的人的信用关系,而不是象欧洲那样是依靠建立在法律秩序基础上的物的信用关系,所以无论华侨社会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上述居住国的华侨经济还是能够得到发展和壮大。

已故须山卓教授是研究华侨经济的著名学者之一。战后,他出版和发表的著述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例如《马来亚华侨的经济活动》(1961年)、《帮的结构——华侨经济的本质》、《原始积累过程的殖民地与华侨》(1965年)、《东南亚华侨企业的经营活动》(1971年)等论文和《华侨经济论》(1970年)、《华侨经济史》(1972年)等著作,<sup>⑬</sup>对华侨社会的“帮”所作的研究,使他独享成名。《华侨经济史》是他晚年的主要著作,书中对“华侨”一词的来源和使用,对契约华工和华侨秘密会社都有独到的研究。该著作还明确指出“华侨问题的本质是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政治相联系而发生的种族、民族利害矛盾。”这些观点是作者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无疑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不过,《华侨经济史》只写到20世纪

初, 华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历史阶段没有涉及到, 不免令人有遗憾之感。

另外, 内田和须山两位先生关于华侨问题的研究也有些共同点, 一是对华侨社会经济的研究是放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延长线上来进行的, 强调中国的巨大影响; 二是贯穿着“华侨不变论”的基本观点, 对华侨在战后东南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注意甚少, 反映出日本老一辈华侨研究家的局限性。

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 李国卿教授的《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一书,<sup>④</sup>则是从探讨华侨资本在当地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出发, 着重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东南亚华人如何适应变化、寻求发展出路问题。六七十年代, 东南亚动荡不安, 尤其是印度支那形势的剧变, 使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面临新的危机, 而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又面临新的选择。在此情况下, 华侨、华人经济的出路何在? 李国卿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如下看法: 第一, 总结了华侨资本的形成过程, 指出东南亚华侨都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要是商业)建立起他们目前的地位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他们对华侨、华人政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东南亚国家保障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 充分发挥他们的经济机能, 华侨、华人就能同时使其资本趋向资本主义经营和工业化, 使这些国家在面向出口工业方面取得大的成效。因此, 东南亚国家必须对华侨政策持慎重态度。第二, 在探讨华侨、华人资本今后的出路时, 李国卿提出了华侨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与当地通力合作以发展居住国经济, 其他别无选择。具体的做法, 华侨有必要将过去华侨资本赖以形成的基础——商业流通领域让给当地居民去经营, 而华侨资本应成为当地“民族资本的先驱者”去转向经营那些承担国际竞争压力的近代工业、对外贸易、航运、金融等经济领域的经营, 为了实现这一转化, 华侨居住国

必须采取相应的可以接纳华侨的体制, 对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人, 应取消一切差别待遇。

第三, 华侨、华人作为少数民族集团, 与当地民族(原住民)之间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不信任感或反感, 创造出一个融合和合作的体制。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环境, 如果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无法得到保证, 华侨资本又会变成“吉普赛资本”在世界各地流浪, 结果必然使东南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并出现那种印度支那难民涌向世界的悲剧。应该说, 李国卿先生的看法是有见地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 东南亚国家要取得自身经济的发展, 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接纳华侨、华人的体制, 保障他们的经济地位, 发挥其经济机能, 而不是相反的做法。越南在70年代采取驱赶、迫害华侨、华人的政策, 几十万华人被迫离开越南, 结果造成本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以致到了80年代中后期, 越南不得不改变和调整对华人的政策, 纠正过去的错误。这沉痛的教训, 亦是居住国应正确对待华侨、华人的一个典型例证。

#### 4. 关于华人企业集团及其经营方法的研究

关于华人企业集团(或“财阀”)的研究, 向来是日本学者和有关经济部门感兴趣的课题, 涉及这一课题的文章、著述并不少见, 其中岩崎育夫的《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一书值得介绍。<sup>⑤</sup>该书把华人经济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研究结合起来, 分析了战前就已活跃在新加坡的华人企业, 在战后是如何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而形成为企业集团的。全书共列举了17家较大型的华人企业集团进行分析, 有金融企业集团、商业服务企业集团、制造业企业集团、家族式企业集团以及其它的企业集团等类型, 最后归纳出华人企业集团的若干特点和发展趋势, 是一部深入解剖国外华人企业集团的资料性强的学术著作。

有关华人企业(或华侨经济)经营方法、成功之路的研究,已出版了诸如冈本隆三的《华侨王国——东南亚实力者》(1966年)、《华侨经商之法》(1971年)、《华侨集团——实力与经商之秘诀》(1973年)、白义神夫的《华侨经商方法一百条》(1971年)、上冈一嘉的《华侨的商业——国际性与生命力》(1976年)、南康文的《华侨如何致富》(1987年)等等。日本经济新闻社编辑出版的《华侨:商业才干民族的面貌与实力》一书,也属这类著作。作者发挥了新闻工作者的特长,以采访华侨商业为中心,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地华人(包括日本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经营方式及其影响,夹叙夹议,也是有其特点的介绍华人经济的书籍。

#### 5. 关于华人经济与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

华人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海外华人的投资问题。由于收集资料方面的困难,日本出版或发表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不过,关于华侨资本与台湾经济关系,却有一篇出色的论文发表,即涂照彦教授的《台湾经济与华侨资本——“政侨资本”的形成及其实态》。<sup>⑥</sup>作者现任教于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是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因此,作者能将海外华侨资本问题放在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来探讨,进而揭示华侨资本在台湾的特殊形态,而不是一般地讨论华侨投资规模及其作用。作者在文中论述了1952—1989年间华侨资本在台湾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阶段,分析了华侨资本在台湾经济从替代进口到面向出口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台湾的华侨政策等。他认为华侨资本在台湾的活动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期(1952—1960年)、成长期(1961—1970年)、加速发展期(1971—1980年)、新兴工业化时期(1981—1989年)。根据作者的统计,前两个

时期中(1952—1970年)华侨投资只占投资总额的9.9%,后两个时期华侨投资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资本有集中的投入,占华侨投资总额的90.1%。从华侨资本来源地看,前两个时期主要是来自香港、日本、菲律宾,后两个时期主要来自香港、美国、新加坡、菲律宾;从华侨资本的投资领域看,总的说来服务业、非金属工业、金融保险业占了投资总额的51%,服务业和金融业是华侨资本的传统行业,对台湾的投资也显现出这一特点。本文还深入一步研究了华侨资本在台湾金融(保险)市场中的地位,并以在台湾的主要华侨金融机构世华联合商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剖析了其资本关系、人际关系、营业活动以及发展沿革,认为台湾的华侨资本具有“政侨资本”的特性,即是“政府”(官僚、党僚)资本与“华侨”(华商、政商)两者的结合。这种研究也是对中国固有的官僚资本研究的一种新的开拓吧。

### 三

在两极格局已不存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竞争更趋激烈,更加突出。与亚太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华人经济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对它的研究似乎也在不断“升温”。这里要指出的是,华人经济研究是难度很大的课题,这有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困难,更有理论问题不易解决。单以华人经济内涵而论,它在本质上是以文化渊源为背景的种族经济范畴,并不是以地缘或国别为基础的区域经济问题,过份强调华人经济力量的“整合”,或夸大华人经济力量作用,都不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而且在实践上不利于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华侨华人经济问题,促进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关系,造成有利于稳定发展的舆论环境,仍是摆在中外学者面前的严峻任务,这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本文简要介绍和分

析了日本学者对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若干情况(并非全面的介绍和评论),目的是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其实日本以外的各国、各地区学者都在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且富有自己的特点。让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研究成果的交流,以更好地推进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吧。

(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教授)

#### 注释:

- ①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第101—102页,东京岩松堂书店出版,1939年。
- ② 游仲勋《日本的华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2号,1966年月,东京。
- ③ N.A.Simoniya,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Russian Study*, translated by U.S. 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1961.
- ④ 幼方直吉《书评:游仲勋著〈华侨经济的研究〉》,《亚洲经济》杂志第10卷,第12期,第106—109页,东京。
- ⑤ 游仲勋《华侨经济的研究》,第173页,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69年,东京。
- ⑥ 游仲勋《华侨政治经济论》,第77页,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1976年,东京。
- ⑦ 游仲勋《华侨能改变中国吗》,第209—212页,日本PHP研究所出版,1993年,东京。
- ⑧ 同⑦,第218页。
- ⑨ 游仲勋《华侨——经济网络化的民族》,第93页,讲谈社出版,1990年,东京。
- ⑩ 游仲勋《华侨政治经济论》,第90—95页,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1976年,东京。
- ⑪ 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同文馆出版,1949年,东京。
- ⑫ 内田直作《东南亚华侨社会和经济》,千仓书房出版,1982年,东京。
- ⑬ 须山卓《华侨经济史》,近藤出版社,1980年,东京。
- ⑭ 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文真堂出版,1980年,东京。
- ⑮ 岩崎育夫《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90年。
- ⑯ 〔日〕《亚洲经济》,第30卷,第12号,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89年12月,东京。

#### (上接第45页)

#### 注释:

- ① 关于华侨婚姻家庭问题,1930年代,陈达在国内侨乡作过调查,著有《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40年代末,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在新加坡从事实地调查工作和个案研究,撰写《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除此之外,迄今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
- ② 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第17页。
- ③ 林猷鹤:《华人妇女移居三州府》,载《南洋学报》,第22卷,第1—2期合刊。
- ④⑧ 沃恩(J.D.Vaughan):《海峡殖民地华人的习俗》,第23—2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重印本。

- ⑤⑥⑨⑫⑯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50页,第136页,第151页,第53页,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5月。
- ⑦ 力钧:《槟榔屿志略》,卷7。
- ⑩⑬ 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等译:《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第185页,第177—188页,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
- ⑪ 民国二十年院字第647号解释。见杨大文编《婚姻法学》第78页。
- ⑭ 《海外月刊》第14期,第45页,1933年9月。
- ⑰ 参考李忠芳等编:《婚姻法手册》,第438—44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
- ⑱ 熊卫霞:《近代闽粤侨乡社会若干问题研究》,第60页。